

县域高职学校发展40年:实践成就、 问题成因与对策建议

郭俊朝 尹雨晴

[摘要]经过40年的努力,虽然我国县域高职学校规模迅速扩大、质量稳步提升、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多元办学格局初步形成,但是仍存在学校区域分布不均衡、教育资源总体不足、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这不但会阻碍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建议借鉴江浙经验,推动各省县域高职学校均衡发展;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引入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强学校内部治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

[关键词]县域高职学校;人才培养;市域产教联合体;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

[作者简介]郭俊朝(1974-),男,河北平乡人,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硕士。(河北邢台 054035)尹雨晴(1972-),女,河北威县人,邢台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河北邢台 054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利益相关者视域下的公办职业技术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21GL037,项目主持人:刘彩琴)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6-0026-06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4.06.004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县域经济快速均衡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县域高职学校可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大量技术技能人才,县域高职学校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应用技术服务能力,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其发展状况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较大。因此,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在现代县域高职学校创立40年之际,梳理其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成就,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助力县域经济快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县域高职学校的发展历程与主要成就

(一)发展历程

县域高职学校是指设置在县、县级市、旗、林区等(以下简称“县(市)”)行政区域内的高职学校、校区、分院、教学点、二级学院、产业学院。20世纪80年代,我国东南沿海及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率先创办了一批新型地方性大学——职业大学,这就是我国最早具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性质的学校^[1]。1984年,我国第一所县域高职学校——沙洲职业工学院创立,标志着我国县域高职教育的产生。此后,全国各地不断有一些县域高职学校设立。1999年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县域高职学校发展加速,教育规模迅速

扩大。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发展高峰期:一是1999—2013年的改造期。这一时期,许多县域中专学校、职业大学、职工大学、成人学校和高专学校通过升格、改组、改建为高职学校。二是2014年至今的新建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各地加速建设了一批县域高职学校,这段时间以新建学校为主。本研究基于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官网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截至2024年1月31日,我国共设有424所(个)县域高职学校、校区、分院、教学点、二级学院、产业学院,涉及384所高职学校(香港、澳门和台湾未列入本次统计),分布在26个省份的283个县(市)。在这384所学校中,有些院校发展较好,其中1所设有23个县域分院和教学点,1所设有3个县域校区,16所各设有2个县域校区、分院、二级学院、产业学院。本研究之所以把一所学校的多个分院计为多所(个)学校,是因为研究内容涉及职业教育政治经济学范畴,一所学校的多个校区设在不同县(市),每个校区主要与所在县(市)及其周边产业和企业发生互动关系,所以,这里的县域高职学校数实质上就是这种互动关系数。

(二)主要成就

1. 教育规模快速扩展。40年来,我国县域高职学校数量不断增长,特别是最近20多年,数量增长很快。学校已从几所迅速增加到424所(个);学校分布从少数几个县(市)快速扩展到283个县(市);2023年学校年招生总数达到90多万人,在校生总数达到270多万人,分别占到全国高职学校招生总数与在校生总数的16.7%和16.2%。

2. 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县域高职学校由于多方面原因教育质量普遍较低。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经费投入力度的逐渐加大,学校设施不断完善,师资力量不断壮大,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不断改进,

校企合作日益紧密,许多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稳步提高。

3. 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县域高职学校一直致力于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近年来,县域高职学校积极开展社会培训、技术研发、技术推广等活动,为当地企业、农村和社区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服务。同时,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共同富裕工作的持续推进,许多县域高职学校社会服务能力得到了提升,学校改革与产业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产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4. 多元办学格局初步形成。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县域高职学校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办学格局。学校与行业企业、其他学校等合作办学,开展订单培养、定向培养、联合培养等,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提升了企业和学校合作培育学生的能力。此外,许多学校还与非洲、俄罗斯、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合作,培养了一大批外国留学生,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了贡献。

二、县域高职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县域高职学校区域分布不均衡

本部分涉及大量数据统计,因此需对部分数据先予以说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已完全城市化,没有县域高职学校。重庆和广东城市化率较高,城市对学校的虹吸效应较强,它们的县域高职学校不多。新疆(含生产建设兵团)、云南、贵州等地州府驻地、地区公署驻地、师部驻地(师市合一)县级市较多,地级市较少;同时,新疆、甘肃、云南和贵州为“一带一路”建设重点省份,近年来受国家政策扶持力度较大,所以这些省份县域高职学校相对较多。据此,以上9个省份的县域高职学校数计入全国县域高职学校总数,但不列入本研究分析范围。

基于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官网数据统计分析可知,县域高职学校在全国的区域分布呈现出马太效应。目前,全国省均县域高职学校数

是13.7所(个),数量不多而且区域分布不均衡,河南(57)、江苏(32)、福建(28)、浙江(19)、湖南(24)、山东(21)、安徽(19)等东中部经济强省县域高职学校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数,广西(9)、山西(7)、吉林(5)、内蒙古(4)、黑龙江(1)、辽宁(1)、青海(1)、宁夏(0)、西藏(0)等经济发展较慢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县域高职学校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数。可见,在全国大部分省份之间县域高职学校数量分布呈现马太效应。此外,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来看,2022年全国经济百强县(市)共设有127所(个)县域高职学校或分校,而前50强县(市)就设有97所(个)县域高职学校或分校。可见,在全国县(市)之间县域高职学校数量分布也呈现出马太效应。究其原因,应是由其历史和发展模式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深层成因来看,其根源是经济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经济发展快的县(市)通过举办高职学校留下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反过来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形成了县域经济与县域高职教育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状态。然而,经济发展较慢的县(市)却相反,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县域高职学校教育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均

从全国范围来看,县域高职学校教育资源总体不足,在不同学校之间分布不均衡。县域高职学校是一个不同于城市高职学校的群体,它包括城市迁出学校、升格改造学校、新建学校和分校。根据本研究的统计数据可知,在424所(个)县域高职学校中,有142所城市迁出学校、147所升格改造学校、81所新建学校、54个分校。从财政拨款上来看,城市迁出学校大多属于省级政府或省会城市,生均财政拨款和学生学费收入相对较高,学校教育资源总体相对充足,师资力量相对较强,教学设施相对较好。然而,其他县域高职学校因生均财政拨款主要来源于地级政府而大大减少,尤其是54个县域分校。

它们是城市高职学校与县级政府的合作学校,是县域中专学校与高职学校分校的合体学校,财政拨款主要来源于县级政府,拨款数额在全国高职学校中最低。从学费收入上来看,城市迁出学校大多位于大城市周边工业区或开发区,虽然学校所占土地位于县(市),但是事实上学校仍然处于大城市发展规划中,具有区位优势,对于优秀教师和优质生源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其他县域高职学校大多位于县城,有些还设置在工业区或乡村,这些地方大多不通高铁、环境条件艰苦、工资收入不高,对青年教师吸引力不强,难以招聘到高学历高水平人才;同样原因,其对于优质生源吸引力也不足,招生面临各种困难。

(三)县域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总体不高

虽然近年来县域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在稳步提升,但是提升速度未跟上县域经济发展,仍然难以满足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需求。究其原因,一是生源质量较差。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大中城市高职学校,而不选择区位优势较差的县域高职学校,因而这些学校历年招生分数都很低,学生缺乏学习目标、学习兴趣和学习的动力,学习能力普遍差。二是师资力量薄弱。同样因为区位优势、条件劣势,许多高学历高校毕业生宁可在大城市中寻找专业不对口的工作,也不愿意到县域高职学校任教,导致许多县域高职学校难以招聘到高学历高水平教师。三是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材与产业发展脱节,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市场需求^[2]。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市场对人才需求产生了巨大变化,县域高职学校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没有进行动态调整,教师自编教材能力不高,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所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县域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四是基本技能培养不到位。专业实习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需要进行的基本技能训练,是技术

技能人才成长的基本环节。然而,由于许多县域高职学校教学资源不足、实训条件差、实训设备落后,导致学生基本技能培养受到很大影响。五是学生实践锻炼机会少。顶岗实习是在学校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培养基础之上必须进行的综合实践教学过程,是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关键环节。然而,由于学校、学生和企业等多方面原因,目前我国县域高职学校学生顶岗实习大多仍然流于形式,缺乏真实工作岗位锻炼,影响了学生生产实践能力的培养。

(四)县域高职学校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普遍不强

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是一对既相同又有区别的能力,前者偏重学术研究,后者偏重市场应用。根据高职发展智库发布的2022年、2023年全国高职学校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的学校信息统计,2022年全国共有404所高职学校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其中县域高职学校74所;2023年全国共有159所高职学校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其中县域高职学校26所(与2022年相比较,2023年的统计项目种类有部分调整)。由以上数据对比可知,虽然近年来县域高职学校科研能力有所提升,但是提升速度仍然跟不上城市高职学校,总体表现为科研能力普遍不强。此外,根据《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3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数据统计,在2022年科研社会服务总经费排名前200名的高职院校中,县域高职学校只有14所;在2023年东部地区服务贡献卓越高职学校50强、中部和东北地区服务贡献卓越高职学校50强、西部地区服务贡献卓越高职学校50强中,县域高职学校各有4所、5所、8所。从以上数据对比可知,虽然近年来县域高职学校社会服务能力有所提升,但是提升速度仍然不如城市高职学校快,总体表现为社会服务能力普遍不强。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县域高职学校建校的基础是中专学校或成人高校,其科研活动

原本就不多,而且教师群体的学历、科研能力普遍较低,大多没有受过优质的学术训练;同时,学校对科研工作不够重视,致使教师科研意识薄弱。另一方面,大部分县域高职学校建校历史较短,主要工作还集中在教学改革方面,对社会服务工作投入精力不足,对服务理念认识不深,主动服务的意识不强;同时,县域高职学校校企合作多流于形式,教师很难得到充分的锻炼^[3],不但不能有效提升职业素养,更无法为企业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技术支持。

三、县域高职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借鉴江浙经验,推动县域高职学校均衡发展

从全国县域高职教育发展现状来看,江苏和浙江处于全国领跑位置。江苏在中高职教育衔接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探索出了一条县域高职教育发展的新路径^[4]。2003年,江苏省独创了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小学院、大校”办学模式,该校与县级政府合作,利用县域中职教育资源在22个县(市)开设了23个分院(办学点)。这种模式对于县域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特征是“在地化”,它培养了学生对本地的深厚感情,有效避免了大量高职毕业生外流情况的发生,为县域产业发展留住了人才。近年来,这种模式被四川、辽宁、贵州、山东等许多省份借鉴学习。浙江主要采取“下沉到县”的办学模式,由大中城市中的一些优质高职学校与县级政府合作共建新校区,保证了优质高职教育资源更加高效地“复制”到县(市)。其主要办学方式包括校区、分院和产业学院三种,例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和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分别与本地县(市)共同建设了县域校区、分院和产业学院,构建了县域高职校区多元共融模式^[5]。这三种办学方式实质上相当于城市高职学校在县域孵化了新的高职学校,与江苏模式相比,它更加高效地解决了产业工人的“在地化”培养,但不足之处在于投资

巨大。

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都具有典型的“在地化”教育特征^[6]。江苏模式是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发布之前创立的,对体系规划的形成和落实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全国高职教育“在地化”探索发挥了引领作用。浙江模式是在县域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的前提下创立的,它发展了高职教育“在地化”的实现方式,虽然投资大,但教育效果更好。因此,建议教育部协同其他部委总结江浙经验,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增加对欠发达地区县域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帮助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发展县域高职教育,加快这些地区优质高职学校进行县域“在地化”探索;地方政府和中职学校在学习江苏模式时,要坚持群众思维,把好质量底线;中职学校要把教育质量提升提高到学校发展战略的高度,从学校运行制度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专业与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按照城市优质高职学校标准进行建设完善。

(二)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引入社会和企业资本

近年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成为高职学校改革的难点。2022年,我国加快了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步伐,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支持省级政府以产业园区为基础,集聚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产教联合体,有效推动各类主体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地方政府应作为主要负责人,牵头建立实体运作机构,搭建共建共享的政企校研合作平台,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两支调节力量建立各方利益平衡机制,促进各方协同发力,形成良性运行的生态系统^[7]。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将发展较慢的

县域高职学校纳入重点建设范围,制定相关政策,将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这些学校倾斜^[8],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鼓励支持企业为县域高职学校实践教学提供实训基地,或与县域高职学校共同打造符合生产实际的实训中心,抽调技术骨干为教师和学生进行技术指导;鼓励企业参与县域高职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专业设置、课程与教材开发等,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三)加强学校内部治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县域高职学校不仅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社会公平的润滑剂,也是学生个性发展的动力源。其发展关涉重大民生问题和经济问题^[9]。因此,要加强学校各项建设,办好县域高职教育,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是明确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县域高职学校应根据县域优势和特色产业需求,服务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学生成长就业需要,开设与县域特色产业和就业市场紧密相关的专业,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共同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这种办学定位决定了其培养目标是以县域就业为导向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具体来说,人才培养规格向精细化、个性化、艺术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变,人才素质培养向创新能力、审美能力、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等方面转型^[10]。二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县级政府应积极发挥其统筹职能,主导建设“产学研创”联盟;使政企校四方联动,共建专业产业联动机制;深化校企合作,开发建设重点新兴专业;紧密对接现代服务业,提升继续教育成效^[11];适应县域社会发展要求,发展养老护理等领域本科专业;利用行业协会连接作用组织编写新教材,适时动态更新教学内容。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师聘用制度,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打通教师和企业技术骨干双向流通的渠道。已入职的新教师严格落实为期1年的教育见习与为期3年的企业实践制度,再招聘的教师必须具有3年以上企

业工作经历和拥有高职以上的学历;同时,为专业教师提供定期赴企业实践的机会,为企业技术骨干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等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四是注重学生实习实训。深化产教融合打造校企利益共同体,完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创建“基本技能—综合技能—生产技能—实践创新能力”四级能力递进实践教学体系,定期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大赛,提高学生技术技能水平;同时,还要重视学校特色发展,厚植工匠文化,培育学生工匠精神^[12],使其形成工匠性格,养成工匠习惯。

(四)完善体制机制,提升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

近年来,县域高职学校大多已经完成基本建设,教学改革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应加快完善学校的体制机制建设,推进学校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一是引进高水平人才,优化学校科研师资结构。加强与行业企业、技术研发型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拓宽高水平高研究能力教师的来源渠道,加大对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高技能人才引进力度,形成高层次科研人才队伍;按照专兼结合、“双师”组合的要求,着力打造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专业实践能力的高水平教学创新团队;以专业建设为依托支持专业带头人带领团队开展技术研发活动,培育行业权威专业带头人^[13]。二是派送教师外出交流学习,提升科研与社会服务意识。县域高职学校应将具有科研和社会服务热情的教师派到应用型研究实力较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交流学习,让教师带着“县域需求”和思考,在交流中感受科研氛围、深刻领悟社会服务理念,增强科研与社会服务意识^[14]。三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完善学校科研与社会服务制度。各级政府制定县域高职学校科研和社会服务保障政策,促进政企校研紧密结合,为教师参与社会服务创造环境;设立社会服务专项资金,制订专项发展计划,鼓励教师参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完善教师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将“科研成果(奖)”和“社会服务”部分所占比例各提升到17%,在“学历进修”部分将连续外派学习超过2年的按硕士研究生打分,超过4年的按博士研究生打分,增强教师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郭俊朝.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高教研究,2008(2):59-61.
- [2]廖霞.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县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思路[J].教育与考试,2021(5):69-75.
- [3]张卫民,刘芳雄,王建仙.“双高”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实践图景与提升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4(2):66-71.
- [4]教育部.关于批准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定[EB/OL].(2023-07-24)[2024-01-17].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00/202307/t20230724_1070571.html.
- [5]邵焕荣.小县城如何办好大职教——高职院校下沉到县的浙江探索[N].浙江教育报,2023-02-28(2).
- [6]王孝坤,傅琼,陈化贤.加快发展中高职衔接的县域高职教育[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9(6):16-18.
- [7]李梦卿,陈姝伊.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机理、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3(12):83-90.
- [8]陈姜媛,安冬平.职业教育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任务型组织的理论分析框架[J].教育与职业,2024(1):37-43.
- [9]姜大源.刍议如何做好职业教育这篇大文章[J].教育与职业,2015(32):5-8.
- [10]侯延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再认识[J].中国成人教育,2020(19):20-23.
- [11]徐春红,董鸿安.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3(2):6-11.
- [12]王少芳,张智明.黄炎培职教思想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J].现代职业教育,2023(35):89-92.
- [13]岑家峰.新时代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现状及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1(18):47-52.
- [14]吴俊梅,广少奎.县域高职教育赋能乡村振兴:逻辑引领、功能定位与实践指向[J].教育与职业,2023(13):29-36.